

魯迅傳論

矢風而

六略名周故

陳

越著

立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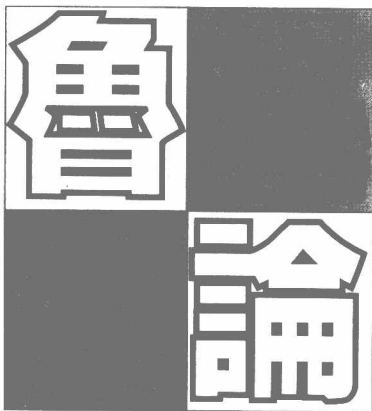
里天不察我以我白屠

軒轅

二十一歲時作五十一歲時

寫七時三未二月七日也魯也

海南出版社



陈越

著

LUXUNZHUANGLUN



海南出版社

教育研究论丛

主编 王松泉 钱威

(琼)新登字04号

鲁迅传论

LUXUN ZHUANGLUN

陈越著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海口市花园新村)

浙江上虞科技外文印刷厂印刷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56毫米 1/32 印张:8.25

字数:19.5千字 印数:0001-2000

ISBN 7-80617-390-0/G·136

定价:18元

序

王嘉良

鲁迅是说不尽的。其所以说不尽，是在于鲁迅本体的无限丰富性和解读鲁迅、逼近鲁迅的困难与艰辛。鲁迅的思想博大精深，我们可以部分认知而很难全部把握；鲁迅的创作内涵十分丰富，经得住后人细细咀嚼不尽思索。郁达夫在称颂鲁迅的“伟大”时曾有言：“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像这样一位思想超凡绝伦、才华无与伦比的文化伟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对其的探索与思考自然也不可能会有尽头。这或许既是解读鲁迅的艰深所在，同时也是鲁迅研究的无穷魅力所在。由此而产生一茬又一茬鲁迅研究者，出现层出不穷的鲁迅研究著作，日渐丰富着我们对鲁迅的认识；而且也正是这样不断的探索、研究，不断的深化、超越中，使我们有可能日渐走近鲁迅，并于继承这位伟人巨大的思想文化遗产中加厚自身的积累，使自己变得更为丰盈与充实。

在众多前赴后继的鲁迅研究者中，陈越先生就是认真执着而又卓有成果的一位。近二十年来，他在治中国现当代文学时，始终把鲁迅研究定为首选目标，发表了数

量颇为可观的论著，且时见新论于学界，为国内同行所瞩目。身为越人，对越文化传统与地域背景及其所孕育的文化伟人的亲和与熟知，显然是其选择鲁迅的不可或缺的原因；然而，作为研究者，对一位超越地域、超越传统的堪称为中国 20 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产生那么浓厚的研究兴趣，恐怕远非故乡人钟情故乡作家一种因素所致。事实上，陈越先生的鲁迅研究范围相当广泛，选题涉及思想、文化、艺术及鲁迅的各类创作研究，其中自然不必绕开挖掘“故乡”材料的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其研究重点显然不在十分稔熟、极易得手的地域文化方面。相反，他的许多研究成果大抵与“故乡”无关，而是在一些事关鲁迅思想与创作的重要学术问题上作着思辨性的探索，内中还包括在前人已有所论及的话题上作深一层次的思索，显示出自己解读鲁迅的一种新的理解与发现。例如眼下的这本《鲁迅传论》，诚然不是一个新鲜课题，迄今为止，以“立传”形式出现的鲁迅研究专著少说已不下 10 部；然而，宏观审视鲁迅的阔大气势，从“论”入手把握传主的生平、思想与创作的独特研究视角，依然使这个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话题别有一种新意，既显示出这本著作无可漠视的存在价值，同时也在同类课题的深化中为说不尽的鲁迅预示了一种广阔的研究前景。

《鲁迅传论》在传记型论著中的深化，集中表现为著者对鲁迅本体的理解，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切入，展示了“作为思想家的鲁迅”的价值，从而赋予了全新的鲁迅形象，也使本书在众多传记型鲁迅研究专著中显示出无可

替代的意义。在同一研究课题中寻求突破，思索与探寻新的研究视角是至关重要的。以传记而论，以往已有多种相当完备的为鲁迅立传的著作出版，倘仍是以立传的体例详述鲁迅的生平、事迹，这可能会增加一些新的史料性内容，但就其整体而言却难以超越前人，更罔论在研究思路上有突破了。本书颇为可取的一点即是：避开单纯为鲁迅立传的体例，尽力发挥自己在理论思辨上的优势，以传的框架、论的思路建构全书，从而找到了一条以传论鲁迅而又能把握鲁迅全人的新路子。同时，它又有别于一般“评传”：在“传”与“论”的配置上，显然突出了“论”的比重，“传”只是作为线索、作为背景显示，而各章中的实质内容则是“论”，而且它还有一个“作为思想家的鲁迅”的中心命题贯串于各章，使“论”的色彩更为浓重。因此，作为一部传记型著作，本书与其说是以“传”见长，毋宁说是以“论”取胜，这无形之中加深了对更为内在的鲁迅本体的理解与把握，同时也是对以往研究思路的一种拓展，一种深化。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以“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为中心论题阐说鲁迅，重塑鲁迅形象，提示鲁迅最本质的价值所在，不失为是一种很有眼光的选择。对“鲁迅的方向”、“鲁迅精神”的本质内涵的理解，历来是众说纷纭的。以往人们熟知的三个“家”的历史评价，大体上是从三个方面等量齐观，就没有特别强调“作为思想家的鲁迅”的一面。而在“革命”、“斗争”气氛甚为高涨的年代，“革命家的鲁迅”的一面被突出与强调，于是集中张扬的

是“鲁迅是中国革命的一面镜子”的意义与价值，鲁迅本人及其著作也往往成为历次“革命”运动中的有力“武器”。这种由对鲁迅的误读而造成的负面影响，证明着把握鲁迅精神的实质是何其重要。事实上，鲁迅之成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成为20世纪中国无人超越的杰出作家，其最重要的价值是在思想方面。不但作为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鲁迅提出的以“立人”为核心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以及他在对历史与现实的透辟认识中作出的巨量思考与惊人发现，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笔巨大的遗产，即便是其各种形式的创作虽经岁月淘洗而始终熠熠闪光，同样主要取决于作家渗透于创作中的闪亮的思想光泽。后来者难于超越鲁迅，的确有艺术功力不足的因素，但最主要的、最根本的因素是思想功力不及鲁迅。中国于鲁迅之后不再有鲁迅，很难见到当年鲁迅那种极具思想震撼力的作品，就在于中国作家中缺少像鲁迅这样兼具思想家的作家。因此，呼唤作为思想家的作家的诞生，当是未来中国文学的重要使命。陈越先生在读鲁迅时，读出了“作为思想家的鲁迅”的不可或缺的意义，并以此为主线贯穿全书，既评述鲁迅思想的独创性，又论说思想对于创作的穿透力，为后世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这是颇值得称道的。

作为一部“传”与“论”结合的专著，《鲁迅传论》在史传性与思辨性的融合方面也有不少可取之处。其中恰当运用史料而不以卖弄史料取胜，重在立于史料之上的论说，是其特点之一。对于写作一部鲁迅传记而言，占有充

足的史料不是一件难事，因经几代鲁迅研究者的不懈探寻与挖掘，鲁迅的史料已是汗牛充栋，俯拾即是。然而，纯粹的史料堆积并不是一部好的传记，作“记帐式”的直白描述更无益于传论。而鲁迅故乡研究者可以做到的无穷无尽的鲁迅家世考证或其童少年时期奇闻逸事描写，固然可以增添阅读兴趣，但同样会冲淡“传论”把握思想家的主导倾向，也是不足取的。本书著者深悟此道，在确定“传论”的写作目标以后，紧扣论述“作为思想家的鲁迅”这一主题取舍材料，突出重要史料的运用，且史料大抵只作为思想家所由产生的背景描述，便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如第二章论说鲁迅的故乡背景，就站在越文化传统的制高点上俯察鲁迅思想生成的“远传统”，见出了运用史料又超越于史料的理论思辨色彩。对于某些常见的史料，为显示鲁迅的行踪，也不能一概不用，但著者似乎更注重对这些史料的评论，道别人所未道，也显示出自己的特色。这在各章中都有所体现，细细阅读，是不难察见的。例如，鲁迅从日本回来后，曾在故乡生活了约一年半的时间。这段经历，在别的一些书中多就事论事地作一般性的叙述，然而《鲁迅传论》却对之作了对相当切实的分析，指出去南京前和从日本归来后在故乡的生活经历，在鲁迅思想上所引起的反映有所不同，后者时间虽不长，却十分重要，它促进了鲁迅思想的深刻化，少了青年时期的浪漫主义激情，多了显得成熟了的现实主义的深沉。就鲁迅故乡的研究者在鲁迅研究中恰当运用史料这一角度而论，陈越先生的这本《鲁迅传论》可以给我们不少启迪。

以往鲁迅故乡的研究者已取得不少研究成果,尤其在鲁迅故乡材料的发掘上有别人无可替代的成就;但弱点是,发掘材料有余,跳出材料作更深层次的研究则不足,似乎故乡人说鲁迅只能说鲁迅的故乡,甚至只能说鲁迅在故乡的行踪,于是层出不穷的鲁迅远房考据之类便满足了研究的需要,这显然有碍鲁迅研究的深入。陈越先生的论著既以故乡人独有的视角体察鲁迅,更以思辨的眼光审视鲁迅,把握鲁迅的一生,实现了理论对于史料的超越,这对于推动故乡鲁迅研究的深化,也必大有裨益。

目 录

序	王嘉良(1)
第一章	作为思想家的鲁迅…………… (1)
第二章	海岳精液, 善生俊异…………… (13)
第三章	台门内外…………… (33)
第四章	万里长风送客船…………… (48)
第五章	缠住灵魂的寂寞…………… (66)
第六章	振聋发聩的呐喊…………… (75)
第七章	《呐喊》、《彷徨》中的怪圈…………… (88)
第八章	《呐喊》、《彷徨》中的西西弗精神…………… (99)
第九章	撕去旧社会的假面…………… (112)
第十章	从民族的走向世界的小说…………… (123)
第十一章	现代题材小说创作中断的原因…………… (132)
第十二章	兄弟参商与“害马”的闯入…………… (150)
第十三章	历史的中间物…………… (164)
第十四章	《野草》、《朝花夕拾》中的人格光彩…………… (180)
第十五章	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 (192)
第十六章	为现在抗争…………… (204)
第十七章	中国的脊梁和坏种的祖坟…………… (217)
第十八章	杂文: “和人生有关”的一项“严肃的工作”…………… (230)
第十九章	民族魂…………… (243)

第一章 作为思想家的鲁迅

冯雪峰说得好：“在中国，鲁迅作为一个艺术家是伟大的存在，在现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作家能在艺术的地位上及得他的。但作为一个思想家及社会批评家的地位，在中国，在鲁迅自己，都比艺术家的地位伟大得多。”（《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1936年7月给捷克译者写的几句话》）对于鲁迅在文学创作上的伟大成就，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作用，他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早已为世人所公认，即使当年鲁迅的一些论敌，对此也不能不承认。当然，许多有识之士也早就指出：“鲁迅先生是思想家，同时也是艺术家”，“每读一次鲁迅的作品，便欣然有得，再读，三读乃至数读以后，依然感到一次比一次有更多更大的收获。他的作品之所以这样经得起咀嚼，其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作品的精深与博大，就是因为他既是思想家，又是艺术家的缘故。”（茅盾1937年3月为日本《改造》杂志写的《精神的食粮》）鲁迅“他并不单单是一个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没有他的思想，他的文学也怕不会这样的光辉。”（艾思奇：《民族的思想上的战士——鲁迅先生》）特别是在1938年10月，“孤岛”上海的一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召开了一次“关于鲁迅思想的研究”的专题座谈会，“从哲学社会科学

的角度”来研究“照耀中国现代史的杰出的思想家”鲁迅。作为座谈会的结果，由李平心执笔撰写了《思想家的鲁迅》的重要长篇文章。文章认为鲁迅是“中国民族的一面伟大镜子”，“他的作品和思想是明彻照透了中国民族的状态和精神，反映了中国民族生活的蜕变和发展”，文章还首次提出了鲁迅在中国文化革命运动中的“主将的地位”。

但是，鲁迅作为思想家，历来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早在二十年代中期，由于鲁迅作品显示的对社会生活的高度洞察力和深刻的哲理性的概括，以及他在思想革命中发挥的巨大的威力，已出现了“思想界的权威”、“思想界先驱”一类的评价，但同时遭到流言家陈西滢以及高长虹等“纸糊的假冠”的嘲讽。1935年5月29日起，李长之的《鲁迅批判》陆续在《益世报》和《国闻周报》上发表。李长之对鲁迅及其作品是肯定的，而且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但是他认为“鲁迅不是思想家”，“他没有一个思想家所应有的清晰以及理论上建设的能力”。次后，1936年5月6日、9日的北平《东方快报》报道了一个叫范任的人，断言“鲁迅没有社会和哲学的理论，没有伟大的思想统系”。1949年7月11日，又有个叫刘文典的在云南大学作关于鲁迅的讲演，认为鲁迅只是“‘斗士’而不是‘思想家’”，“对中国的哲学还没有研究透彻”。

回顾鲁迅研究的历史，否认鲁迅思想家地位的有名有姓的人物其实并不多，且当时就为众人所批驳。但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其影响是否与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一样？在鲁迅研究界，在广大的读者群，乃至于一般的老百姓中，还是一个值得我们再加关注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一般的对历史人物作评判的问题，而是如何面对和估价一份极其珍贵的巨大的思想文化遗产问题，它的

价值,不仅只在于文学领域,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思想领域,不仅仅在于过去,同样还在于现在,在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的未来。鲁迅的思想是如此博大,包容了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美学、教育学等等各个思想领域;他的思想更是如此深刻,几乎在每个领域都提出过发人深省的见解,特别是他对于中国社会和对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的认识的透彻性,更是无人可及,至今还颇具现实意义。一套《鲁迅全集》,就是一部关于中国社会和民族的百科全书。孔子曾以一部《论语》影响了中国二千多年,被称之为伟大的思想家,所以,确实可以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毛泽东:《鲁迅论》,1937年10月19日。)

在否认鲁迅作为思想家的言论中,范任的说法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以为鲁迅没有自己哲学的思辨体系。确实,鲁迅自己就承认:“我知道伟大的人物能洞见三世,观照一切,历大苦恼,尝大欢喜发大慈悲。但我又知道这必须深入山林,坐古树下,静观默想,得天眼通,离人间愈遥远,而知人间也愈深,愈广;于是凡有言说,也愈高,愈大;于是而为天人师。”鲁迅自喻只是“在泥土上爬来爬去”的“沾水小蜂”,“很足以贻笑于大方之家”的,“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这样的东西”。(《华盖集·题记》)但这并不等于说,鲁迅的思想只沾滞于具体的现实问题,鲁迅历来强调“开掘要深”(《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他只是从具体的原生形态的人生现象入手,从深处开掘出普遍性的结论。就此而言,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具有中国民族的思想家的特点。黑格尔说过:“在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体、民族的伦理、民族的方法、民族的风俗、甚至民族的科学、艺术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历史哲学》)。

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思想方法和特点，“因为法国人无暇从事哲学，生活驱使他们走向实践的领域，而德国的现实曾是更合理的，因而德国人能够安静地钻研理论。”（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国的一些学者，也都注意到中国民族与别的民族不同的思想特点，例如王国维就说过：“盖我国之哲学，皆有实际之倾向，而此性质，于北方之学为尤著，此足见理论哲学之不适于吾国人之性质，而吾国人之性质，其彻底彻尾实际之有如是也。”（《戴阮二家之哲学说》）任继愈还对思想侧重点作过比较：“和西方哲学史的发展比较起来，中国哲学中最丰富的是社会历史观方面的材料，因为这方面过于丰富，相形之下，显得自然观和认识方面的材料太少。”（《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显然，我们不能用西方，如德国思想家的模式来看待中国思想家。鲁迅是中国的思想家，他出现于中国的社会，他也必然具有中国思想传统的基因和特征。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即如王国维所指出的，“有实际之倾向”。鲁迅年轻时就因为“风雨如磐闻故园”，而立志“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他的思想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执着于现实人生，活泼、尖锐，带着“人间烟火”气。他对于抽象的超越性的思想和范畴不感兴趣，也不刻意去构建什么思辨体系。他曾在回答别人的问题时说，“木刻的最后的目的是和价值”“这问题之不能答复，和不能答复‘人的最后目的和价值’一样。”“至于木刻，人生，宇宙的最后究竟怎样呢，现在还没有人能够答复。”（1935年5月29日致唐英伟）其次，鲁迅有着独特的思维和表达方式。有一位学者谈到中国思想家与西方思想家在表达方式上的不同：“西方哲学的命题大都是直陈的全称命题，中国人讲话则往往借用形象的描述、寓言故事，意在言外。”（朱启贤：《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鲁迅不是从

自我静观的抽象思辨中推导出观念的思想家,而是现实生活中,从最平凡的,也是最生气勃勃的,原生形态的人生现象中提炼出深邃的,带有普遍性意义的思想命题,而同样以非常形象生动的形式加以表达。在这一点上,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和作为文学家的鲁迅,是相得益彰。鲁迅文章中充满着辩证法的活力和形象思维的魅力,鲁迅笔下的许多概念是具体的,个别的,然而,又都具有普遍意义。瞿秋白很早就指出了,“其实,不但陈西滢,就是章士钊(孤桐)等类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做社会上的某种典型。他们个人的履历倒可以不必多加考究,重要的是他们这种‘媚态的猫’,‘比它主人更严厉的狗’,‘吸人的血还要预先哼哼地发一通议论的蚊子’,‘嗡嗡地闹了半天,停下来舐一点油汗,还要拉上一点蝇矢的苍蝇’到现在还活着,活着!”(《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独特的思维方法和表达方法,既和中国古代灿若群星的思想家们一脉相承,又明显的优于他们,因为他不但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

鲁迅的思想博大精深,而其核心,则是“立人”思想,“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文化偏至论》)。鲁迅“立人”思想的形成,一方面是基于他非常广阔的世界的视野,另一方面又基于他对中国现状和历史渊博的深刻透析。年青的鲁迅,和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样,放眼世界,寻求着救国的道路。他既注意到了西方先进国家自然科学和生产力的突飞猛进,“观于今之世,不瞿然者几何人哉?自然之力,既听命于人间,发纵指挥,如使其马,束以器械而用之;交通贸迁,利于前时,虽高山在川,无足沮核;饥疠之害减;教育之功全;较之百祀前之社会,改革盖无烈于是也。”(《科学史教篇》)又研究了西方社会变革之势潮,“革命于是见于英,继起于美,

复次则大起于法朗西，扫荡门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权，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文化偏至论》），鲁迅在1907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抵在人”。而在此之前。还在1902年，他和许寿裳一起在东京弘文学院读书时，就已经关注于“中国人”的“国民性”的问题，“有一天，谈到历史上中国人的生命太不值钱，尤其是做异族奴隶的时候，我们相对凄然。从此以后，我们就更加接近，见面时每每谈中国民族性的缺点。（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他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毕生孜孜不懈”。（许寿裳：《回忆鲁迅》）鲁迅“立人”这一思想核心的形成，正是在这1902年至1907年期间。此前，是他形成“立人”思想的准备期，特别是故乡的十八年生活，家庭的变故让他看破了“世人的真面目”，“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朝花夕拾·琐记》），因之促使他“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呐喊·自序》）。走出故乡，走出国门，拓宽了鲁迅的视野，他获得了新的参照系，他一方面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另一方面又关注于世界各国发展潮流，在这纵向的时间和横向的空间所构成的坐标中，鲁迅确定了他“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事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的思想核心。

显然，形成鲁迅“立人”思想的逻辑起点是缘于“国民性”的思考；而“立人”思想的实现其具体途径则是改造国民性，因此，诚如许寿裳所言，鲁迅对改造国民性的工作是“毕生孜孜不懈”。鲁迅正是从“立人”的崇高理想出发，弃医从文。而“文学是人学”（高尔基语），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与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统一与和谐，鲁迅在他的小说、散文以及大量的杂文中，终其一生

对国民性的弱点作了锲而不舍的批判。当然，在鲁迅一生的各个阶段，对国民性的抨击又是同中有异的。在早期，鲁迅是从启蒙主义出发，认为改造国民的精神，是改造社会的“第一要著”。在中国近代思想家中，谈论国民性问题最早的是梁启超。梁启超在他的《新民说》中提出了要“新国”必先“新民”，“新民”为当务之急，从救国的意图出发，他主张必须研究和改造国民性。梁启超还写有《中国积弱溯源论》、《国风》、《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等篇，对中国与西方各国的民族性进行比较、对照，分析中国民族性的弱点，从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寻找国民性形成的原因，并主张对中国国民性实行“破坏”，加以改造。梁启超以及严复、康有为等为代表的形成于19世纪末的近代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受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影响，主张借思想文化的革新来解决社会问题，换言之，即是从彻底转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完全重建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入手。作为第二代知识分子代表的鲁迅，显然地受着第一代知识分子思想的影响。当然，鲁迅关注国民性，是基于群众的觉悟程度、精神状态与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国家的目标之不相适应，而不是如梁启超那样服务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目的，以国民性的弱点来主张保皇的合理性。所以，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的主张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强烈的社会改革的精神。辛亥革命后“骨子里依旧”的社会现状，进一步促进了鲁迅对国民性问题严重性的关注：“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况。其实这也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以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